

烟火深处有山河

——《乌兰图嘎》的味觉与记忆

◎冯永平

内蒙古籍作家吕阳明的小说得了人民文学奖,名字却不大张扬,叫《乌兰图嘎》——蒙古语意为“红旗”。故事就落在这面“红旗”下,呼伦贝尔边境一家蒙餐馆里。餐馆老板“我”,精明,也带点小市侩、善良吧,可又挺粗鄙。离了婚,有个情人,能跟伙计动手打架,也能为陌生人的故事哭得山河失色。这么个开头,不像是唱什么高调,可读下去你才知道,烟火深处,真有山河。

餐馆作为背景

小说最见功力的,是这家餐馆的活法儿。它可不是个死板的布景板。这屋子有呼吸,有记忆,人来人往,全是关系。早上熬奶茶的雾气,晌午手把肉勾人的浓香,日头落了,套马杆酒倒进粗瓷碗,那“咕咚”一声响……这些细碎的感受,让你不是“看”个故事,而是整个人被拽了进去,被气味、声音、热气裹着,脑子还没转,身子就先暖了。在这里,你几乎能听见那锅肉在灶上咕嘟的味儿,能看见窗玻璃上蒙着的那层奶白色水汽——好的小说就是这样,不动声色地把你摁在它的世界里。

草原上的人,把“吃”看得重。不是说吃得多金贵,是这顿饭跟谁吃,怎么个吃法,里头有人情,有规矩,有讲不完的故事。所以阿木煮肉,萨仁熬茶,“我”迎来送往,这家蒙餐馆,说白了,就是乌珠小镇的“公共客厅”。信息在这儿串,关系在这儿织,几十年的老事儿也在这儿慢慢往下沉。老妇人从沿海城市来,女儿从远方来,她们压在心底的话,都搁在了这油烟和奶香里。餐馆自己呢,也有一身时代痕迹:从物资紧缺到旅游火了,从土路到自驾车队满街跑——一家小馆子的起落,藏着的是一部边境地区的微观经济史,也是40多年来普通人过日子方式的翻篇儿。

更难得的是,这个空间里还有各种真实的磕碰。“我”跟阿木、萨仁、哈斯巴根,有雇佣,有交情,也有翻脸的时候。哈斯巴根酒后打女友,“我”抄起酒瓶就砸过去,反被他一句“你不是也打老婆吗”噎得半死。这一笔又狠又辣,不藏着掖着,可人物就这么站住了,空间也活起来了。没这点粗粝,后面那些温情就容易飘。这家小馆子不是乌托邦,它就是咱们日常过日子的那个样——有算计也有仗义,有翻脸也有不好意思。正是这种泥沙俱下的真实,让后面那些“高大上”的情感有了落脚的地儿。

两条线,两种时间

老妇人寻初恋,女儿祭英烈,两条线并着走,但不是简单的对照。

老妇人的“寻”是往回走。她心里那个阿木尔——那个为她“挡子弹”的蒙古族青年——早被时光泡模糊了。可当她对着眼前口吃的阿木,一口咬定“你肯定是叫阿木尔”时,这种“误认”比什么“认出”都更动人,也更戳人。她要找的,早不是具体哪个人,而是一段回不去的青春,一种再也捞不起来的纯粹劲儿。人到老了,记忆会骗人,可情感不会。作家没有嘲讽这股

子执念,也没硬往崇高上拔,就让它任岁月里自个儿待着,像一杯搁了多年的老酒,入口涩,过后甘。

女儿那条线,更冷。她的恋人李军,边防战士,为救战友栽进了零下40摄氏度的冰窟窿。打那以后,女儿落下心病,三伏天也得裹着羊绒衫,“像具死尸”。这“冷”是身上的,更是心里的——那巨大的创伤没好好哭出来,就凝成了谁也捂不热的冰疙瘩。直到她看见李军的诗稿《冷的边关热的血》,“整个人慢慢地热了起来”。最后,她换上一身白裙子,登上巡逻艇,在界河上给自己补了一场迟到的“婚礼”。

“冷”与“热”的转化,吕阳明写得极省劲儿。没大哭大闹,没豪言壮语,就靠身体自个儿的节奏:从僵着,到软了,到敞开了。这种写法,比任何抒情都有劲儿。界河在这儿也有了意思:它划开国界,却连着生死;它冰凉地流着,却托住了最烫的情意。

两条线在“我”这儿碰上了头。“我”的转变,是小说最见心思的地方。这个开头算计、自私、油了吧唧的小老板,硬是被母女俩的故事一点一点撬动了。最后那场号啕,哭的是别人,也是自己;哭的是那些陈年旧事,也是眼前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日子。小人物的善良,往往不在平时表态,而是在某个说不清楚的瞬间,突然决了堤。这种被动的主动、卑微里的那一点高,比什么英雄叙事都更接近咱们真实的人性。

语言的减法

小说中的语言,走的是“减法”路线。

写草原,不堆词儿;写心理,不搞大段独白;写历史,不端宏大叙事的架子。对话尤其好,各人说各人的话,话里藏着身份、藏着心机。老妇人的絮叨,女儿沉默底下的那股子劲儿,“我”叙述里偶尔冒出来的自嘲和反讽——搅在一起,像几把不同的乐器在那儿一块儿响。

“质朴”这俩字,弄不好就跟“粗糙”混了。

但细读会发现,这“平白”是设计过的——节奏怎么喘气,留白留多少,都有讲究。比如“髓内针”接羊胸口那个段子:用兽医的法子拿来对付锅里煮的肉,错位得幽默,却透着民间的机灵劲儿,也透着边疆过日子特有的逻辑——专业的边儿在这儿是模糊的,活下来的智慧是大家伙儿通用的。这种“错位”在小说里不止一处:老板用打架解决纠纷,阿木用唱蒙古语歌的办法在蒙餐馆混饭吃。所有这些都告诉你:在这片土地上,规矩是活的,生存是硬的,能接上茬儿的办法就是好办法。

更值得说的是格调。知青题材不好写,很容易滑向两头:要么往死里写苦,要么喊“青春无悔”。吕阳明不站队,他写人的复杂——有理想,也有算计;有牺牲,也有自私;有跨民族的深交,也有身份认同那点说不清的暧昧。阿木死缠着说祖宗八代都是汉族,老妇人却认定他“肯定是叫阿木尔”,这中间的缝隙,正是人最真实的那点儿拧巴。不美化,不丑化,不卑不亢——这是文学该有的态度,也是评论最不好拿捏的尺度。读到那儿你会笑,笑着笑着又觉得心酸:一个汉族小伙子,长着一张蒙古族人的脸,唱着一首蒙古族的歌,在一个叫“乌兰图嘎”的蒙餐馆里当厨师,这不就是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模样吗?分不清,也就不必硬分。这份松弛,比任何口号都更有说服力。

小里藏大,柔里带刚

《乌兰图嘎》拿奖,笔者认为,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由头:这些年文学界地域标签满天飞,“新东北”“新南方”各喊各的,边疆反倒成了不出声的地带。真正的边疆生活——它的烟火、它的矛盾、它在现代里的阵痛,很少有人认真写。



吕阳明的突破,在于他把边疆从“被看”的位置上拽了出来。边境小镇,是开放的节点;边疆居民,是有自己主意、自己能折腾的创造者。“我”在市场里周旋,阿木在蒙汉族身份之间来回切换,萨仁在日常里闷声较着劲——这些“非英雄”的活法,恰恰是边疆最真实的样子。小镇上的人,谁不是这样?开旅馆的小凤,一边跟老板暧昧一边清醒地拒绝结婚;送肉的哈斯巴根,喝完酒打人,打完人又哭着道歉——这些小人物,没有一个被写成“符号”,他们就是他们自己,带着一身的毛病和光亮。

往大了看,“一带一路”、向北开放桥头堡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,都在重新定义边疆的位置:从“边角料”变成“前沿”。《乌兰图嘎》里的蒙餐馆经济,是特色产业的一个小影子;人物之间的关系,是民族团结在日常里最朴素的样子。但这些“大”话题,全化在了具体的烟火里,不生硬,也不贴标签。这种小里藏大、柔里带刚的写法,本身就刷新了边疆书写的路子。这篇小说示范了一种“后知青文学”的可能——不再纠缠于“值不值得”,不再陷在“伤痕”或“无悔”的二元里出不来,而是把那段历史当成一种已然存在的情感遗产,看看它怎么在今天的日子里继续活着。

余韵悠长

合上书,想起小说里的一个画面:女儿那条白裙子。

那是祭奠,也是婚礼;是告别,也是重逢;是冷的终点,也是热的起点。在界河上,在心上人曾经守着的地方,她跟自己讲和了。这一笔,让我想起了艾略特那句诗:“我们叫做开始的往往是结束,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。”

《乌兰图嘎》写的,正是这么一种打转的时间——过去从没有真正过去,它藏在味道里,藏在某个屋子里,藏在咱们这代人的身体里,等着哪天被触动,重新活过来。老妇人寻的是初恋,也是她自己;女儿祭的是英烈,也是以后的日子;“我”哭的是旁人,也是自己从来没好好盘过的那些旧事。说到底,这部小说在问一个所有人都会遇到的问题:那些走散了的人,那些回不去的地方,它们去哪儿了?吕阳明的回答是:它们哪儿也没去。它们变成了你吃肉时突然想起的一个味道,变成了你听某首歌时鼻子一酸的一瞬间……

烟火深处,真有山河。这家小馆子,这些不起眼的人,这段说远不远,说近不近的往事,最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:咱们怎么记事儿,怎么传下去,怎么在这个变得飞快的时代里,守住那些不该丢的东西。

吕阳明的答案,藏在小说最不起眼的那些地方——手把肉的热气,草原上的歌,还有那面叫做“乌兰图嘎”的红旗。红旗在那儿飘着,不声不响,可你看着它,就知道下面有人,有日子,有断不了的血脉。这大概就是好小说的本事:它不大喊大叫,可你放下书很久了,那面旗却还在心里头飘着……

近日,由“青城好人”、内蒙古自治区长城保护研究会会长高晓梅,与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学生、内蒙古“美德少年”王东麟共同创作的《内蒙古长城印记》一书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彩色印刷出版发行。

砖石为经, 长城研究的集成之作

高晓梅与王东麟合著的《内蒙古长城印记》,是继高晓梅在《情系长城》《情系广播》《情系戏剧》《话说长城:内蒙古篇》《故塞长风——内蒙古长城科普摄影集》《美丽乡村筑梦者》《长城拥抱黄河》《古塞遗踪》《长城骄子》《塞上行》等系列著作后的又一扛鼎之作。全书分为:战国长城、秦长城、汉长城、北朝长城、隋长城、宋辽金长城、明长城7章,共13.8万字。书籍以时间为纵轴,串联起战国至明代7个朝代的长城脉络,以空间为横轴,勾勒出12个盟市、76个旗县区的长城分布。作者摒弃碎片化叙事,将长城的军事功能、建筑智慧、艺术成就与文化内涵融为一体,既考证了战国赵北长城、燕北长城的雄姿、金界壕的规划,也解读了明朝大边烽火台的战略价值,实

现了由浅入深、由点到段、由段到面、由面到立体的研究跨越。

翻开书页,读者仿佛跟随作者的脚步踏上了崎岖古道,去触摸战国赵北长城的夯土墙,感受秦代戍卒的艰辛,聆听汉代烽燧的警讯,惊叹北魏长城的独特形制……这种沉浸式叙事打破了学术著作的晦涩,让尘封的历史变得可知可感。书中没有夸张的抒情,只有扎实的考证;没有刻意的拔高,只有朴实的记录,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对历史的敬畏。

光影为纬, 民族交融的生动画卷

内蒙古是全国长城遗迹最长、筑城朝代最多的地区,从春秋战国到明代的长城遗址都有保存。内蒙古长城占全国历代长城总长的1/3,约合7597.7千米,在全国长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,素有“长城博物馆”的美誉。

在作者笔下,长城绝非孤立的军事屏障,而是贯穿中华文明的情感线、文化线、交融线。它既是农耕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,更是民族融合的交汇点,作为互市的关口,它见证了“茶马互市”的繁华;作为走西口的通道,它承载了移民的乡愁;作为古老的城墙,它融入了百姓的生活。书中记录了各民族迁徙、贸易、共生的场景,生动诠释了长城在构

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纽带作用。

这种活态长城的视角尤为珍贵,作者行走于残垣旧壁之间,流连于乡土田园之中,目之所见、耳之所闻、心之所感,缓缓落于纸上。作者不仅关注长城的历史遗迹,更聚焦与之相关的民俗风情:关隘下吃草的牛羊、长城脚下的游牧人家、胡服骑射广场的现代演绎……都让古老的长城焕发生机。正如作者所言:“长城的伟大,不仅在于它是跨越崇山峻岭的物理存在,更在于它是有温度、有灵魂的文化意象。”

镜头为笔, 历史与现实的深情对话

《内蒙古长城印记》最动人的部分,是三代人用镜头记录的110幅摄影作品。从高旺的早期黑白影像,到高晓梅的田野调查照片,再到王东麟的现代航拍作品,以及汪锡铭、甄自明、边玉等长城摄影家拍摄的精美照片,这些图文并茂、图像清晰的摄影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内蒙古长城风貌,起到了普及长城知识、讲述长城故事、宣传长城文化的作用。这些跨越半个世纪的光影,串联起来的生命印记与苍凉的残垣、斑驳的土墙、雄浑的关隘、静谧的烽燧、游客的身影、草原上的牛羊……形成鲜明对比,展现了长城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双重面貌。

《内蒙古长城印记》摄影数量之多、作品之全,弥足珍贵且历久弥新。这些摄影作品不仅是历史记忆,更是情感的传递,它们让读者直观感受长城的沧桑与壮美,也见证了摄影者对内蒙古这片土地的深

情。这些照片生动地呈现了长城作为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和价值理念,全面彰显了长城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多元民族融合文化,是“对内蒙古境内各时代长城的深情礼赞”。其质朴的情感表达,让学术著作充满了人文温度。古朴典雅的装帧设计,让全书兼具科普性与趣味性、知识性与艺术性、可读性与通俗性,成为雅俗共赏的历史文化读本。

传承为魂, 长城精神的时代回响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,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、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。”《内蒙古长城印记》正是对这种精神的生动诠释。作者通过系统梳理长城历史,将其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展现得淋漓尽致,让长城这一中华文化符号更加深入人心,让更多的人了解长城、关注长城、走进长城、保护长城、热爱长城,担负起守护珍贵的长城文化遗产、传播和弘扬长城文化的使命,让长城精神在代代传承中焕发新生。

《内蒙古长城印记》是一部立体的内蒙古长城文化史,也是一部了解古代军事智慧的视觉史诗,更是一曲献给长城爱好者的深情赞歌。让我们翻开书页,在历史的回响中读懂长城跨越千年的重量,从一砖一瓦的细节里汲取智慧与力量,感悟镌刻在万里垣堞之间的自强精神与民族密码,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。



文艺评论乐见『麻雀』成主角

◎周慧虹

“三月撤秧四月栽,五黄六月谷怀胎……”近日,重庆巴南区茶花广场上,木洞山歌剧的高亢乡音刚落,现场观众便便一言我一语热议开来:撤秧歌的节奏能不能更贴合劳作场景?山歌能不能和当下的国风游戏结合推广?没有正襟危坐的专家宣讲,没有艰深晦涩的专业技术语,街坊邻居围坐一堂,用家常话品评文艺。这就是当地坚持了近10年的“麻雀艺评”活动现场。这场以普通群众为评论主角的基层实践,正重新定义着文艺评论的边界,也为新时代文艺发展写下生动注脚。

不同于传统文艺评论的“精英主导、群众失语”,“麻雀艺评”采取“八段锦”工作法,通过作品观赏、故事说艺、麻雀闹春等层层递进的环节,一步步带着群众从“看热闹”转向“看门道”。作为参与群众,从最初不敢发言的旁观者,到能精准指出摄影作品的光线问题,再到能写出获奖评论,不少人在这个平台上完成了蜕变。据悉,近10年来,这项活动已开展600余场,服务群众近30万人次,不仅打磨出《爷爷的山歌》这样的驻场精品,更推动60余件作品走进国家级文艺展评赛事。

让群众成为文艺评论的主角,可以说是当下文艺发展的必然要求。随着新大众文艺浪潮的到来,人人皆可创作,人人皆是主角成为常态,普通劳动者的创作描摹日常、记录时代,为文艺发展注入了生机。但如果文艺评论依然停留在专业小圈子里,用普通人听不懂的术语自说自话,就会切断创作与受众的连接,让基层创作失去反馈的源头。更重要的是,随着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,大家早已不再满足于做文艺的“旁观者”,而是渴望参与其中、表达见解。“麻雀艺评”从群众自发的品评聚会发展而来,恰恰印证了这种内生需求。

这种群众参与的评论模式,为新大众文艺发展注入了活力。对创作者而言,群众的真实反馈是最宝贵的创作养分。从重庆巴南区的实践来看,当地儿歌作者据此得以把字句提炼得更精,艺术团从善如流调整舞蹈编排,使作品更接地气、更合民心。不仅如此,注重调动群众参与的热情,还有助于以此为抓手推动社会治理。当群众的审美能力被不断激发,评论的边界也在不断拓展:从品评文艺作品,到为城乡规划、公共空间艺术、文旅项目建言献策,乡村振兴、城市更新亦可跟着从中获益。正如业内人士所言,当文艺评论在基层扎根,其作用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艺品鉴,成为凝聚群众共识、激发主人翁意识的精神纽带。

让更多“麻雀”站上评论席,还需持续创优群众参与环境。一方面,始终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,打破专业壁垒,用“摆龙门阵”代替“开会发言”,用家常话语讲透艺术道理,降低参与门槛,让普通人敢说、愿说。另一方面,做好机制化的引导与保障,既要常态化活动平台,让群众的参与有处可去,也要有专业力量的适度引导,通过“引你入门”“专家点评”等环节,帮助群众逐步提升鉴赏能力,从“随便说”转为“说得准”。更重要的是,尽可能打通意见反馈的“最后一公里”,使群众声音真正被创作者、相关部门听见与采纳,让参与者的获得感转化为持续参与的动力。

“麻雀”虽小,凝聚起的力量不容忽视。在此意义上,诸如“麻雀艺评”这样让群众成为主角的参与方式,有着最鲜活的烟火气,也藏着文艺发展最深厚的底气。当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从文艺旁观者变成评论者,参与者,文艺评论才能真正走进人民中间,新大众文艺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活力。期待更多这样的基层实践,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安放,每一个普通人能成为文艺舞台上的主角,以微光汇聚照亮时代的文化星河。

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)